

一南澳當閩廣交界之處周圍皆山中有田百頃乃
國初起遺居民遺棄之地也四面蔽風大澤居中
欽定四庫全書

卷五

三

可以聚舟其大視金塘二倍五六年來因浙直以
捕之嚴倭泊無所容俱于此互市福建捕急則奔
廣東廣東捕急則奔福建定期於四月終至五月
終去不論貨之盡與不盡也其交易乃搭棚於地
鋪板而陳所置之貨甚為清雅刀鎗之類悉在舟
中若能密令人於濱海沉滅其舟則在岸上之倭
生擒也何有

四面蔽風大澤居中
集社印

五六年來因浙直
史史
互市福建捕急則

鄭樑在論諸貨之盡與不盡也其交易乃搭棚於

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(卷之類悉在)

學社印

鄭樑生著

文史哲學集成

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(三)

文史哲出版社印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. 十三 / 鄭樑生著. -- 初版
. -- 臺北市：文史哲，民 93
面；公分. -- (文史哲學集成；489)
含參考書目
ISBN 957-549-552-7 (平裝)

1. 儒家 - 日本 - 論文, 講詞等 2. 中國 - 外交關係 - 日本 - 論文, 講詞等 3. 中國 - 歷史 - 明 (1368-1644) - 論文, 講詞等 4. 中國 - 歷史 - 清 (1644-1912) - 論文, 講詞等

643.128

93004833

文史哲學集成

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(十三)

著者：鄭樑生
出版者：文史哲出版社

<http://www.lapen.com.tw>

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
發行人：彭正雄
發行所：文史哲出版社
印刷者：文史哲出版社

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
郵政劃撥帳號：一六一八〇一七五
電話 886-2-23511028 · 傳真 886-2-23965656

實價新臺幣二八〇元

中華民國九十三年（2004）四月初版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ISBN 957-549-552-7

序

本論文集乃筆者有關中日關係史研究，於最近階段的研究短篇集結而成。雖然各篇寫作的時間不同，但都集中在文化、外交、軍事等層面，及其相關事宜逐一探討。

首篇爲〈日本中世禪林的儒學研究〉作一概觀，論述日本鎌倉、室町時代的禪僧們與朱子學的關係，及那些禪僧們對儒學的看法，與夫對宋學所爲之詮釋。由他們的衆多著作裏，我們可發現日本初期禪僧的儒書研究，主要爲便於教化世俗而爲，然隨著歲月的流逝，其爲禪僧之基本立場卻逐漸被遺忘，致爲研究儒書而研究、註釋儒書，忘了身爲禪僧的本分，此實爲朱子學東傳之初始料未及者。

日本自古以來由公卿社會，尤其以儒學爲世襲家職的博士家之儒學，無不根據馬融、鄭玄、何晏、皇侃、孔安國等人之註疏，亦即以所謂古註來講授，而逐漸各自形成家說而秘傳化、形式化、僵化，了無生氣之際，因受新儒學之影響，在保守的公卿之間也從事宋儒新註書的研究，至十五世紀中葉已傾向於宋學，完全根據宋儒新註來立說。地方儒學也受其影響而盛行此一方面的鑽研，因而產生薩南學派與南學派。在此情形之下，日本儒學的內容在其江戶時代，已不完全祖述宋儒之說，而能建立其獨自的領域。

第二篇〈朝鮮東學黨之亂爆發後日本陸軍之動態〉，論述朝鮮自甲申事變以後內政的腐敗，致民衆生活陷於水深火熱之中。當此之時，該國南部爆發了以「除暴救民」爲口號，以「斥倭洋倡義」爲旗幟的反抗政府運動——東學黨之亂。朝鮮當局對此一變亂束手無策，乃請宗主國清朝遣軍協助平亂。此舉竟使一向對朝鮮虎視眈眈的日本藉機出動大軍，企圖與清軍一決雌雄，排除中國在半島上的勢力。

因此，當朝鮮爆發民亂時，日本非僅未同情鄰國發生此一事變而萌助其早日平定內亂之念，反而處心積慮地備戰，使自己能夠趁機獲得更多的利益。所以當其侵略部隊陸續開進朝鮮時，內亂雖已平定，卻認爲日本「現在如不入漢城，將失去機會。」「即使在外交上發生若干困擾，也讓那些兵員進入漢城爲有利。因此，仍以綏靖內亂爲藉口進兵，對朝鮮國未來的政策，則日本政府在必不得已時，將採強硬措施。」故它不僅不肯撤兵，反而採取積極的軍事行動，先發制人。故本文乃對日本之積極備戰的陰謀，與清軍之喪失戰機作一段歷史考察。

第三篇〈甲午戰爭前的中日兩國動態〉，係繼前篇文章後作較深入的論述。朝鮮爆發東學黨之亂後，因一時難於救平，乃要求袁世凱代向清廷請派部隊助戡內亂。袁氏獲朝鮮請援公文後即電告李鴻章。李鴻章即飭丁汝昌、葉志超、聶士成等海陸軍將領，分別統率軍艦與勁旅，配齊軍裝，分乘船艦前往朝鮮，並命駐日全權公使汪鳳藻，將派兵事知照日本外務省，以符〈天津條約〉所訂條款。

日本於聞知清廷有意遣軍協助朝鮮戡亂後，即積極備戰，欲藉此機會戰勝中國，將中國勢力排除於半島之外。因此，當其部隊抵朝鮮之際，因內亂已結束而朝鮮當局要求其撤兵時，不但不肯撤，仍繼續不斷地布署戰爭，復向清廷提出由中、日兩國共同改革朝鮮內政，但爲清廷所拒絕。由於撤軍問題無法解決而朝鮮戰雲密布，雖然如此，李鴻章卻一味迴避戰爭，未作適當的軍事部署，使清廷當局頗爲不滿。後來李氏雖因接到訓令而急速增派兵員前往朝鮮，並妥籌沿海衝要處，惟這些措施尚未獲得妥善安排時，日軍竟在豐島海面突襲中國軍艦，戰端遂開。

第四篇（乙未割臺始末），亦係繼前文所爲之論述。本文首論朝鮮爆發民亂的原委，與中日兩國因此民亂而出兵朝鮮的經緯。次言日本在決定派兵之際所爲之陰謀，尤其是日本陸軍的動態。日本雖積極備戰，李鴻章卻始終主和，所以他雖接到緊急備戰的命令而提出備戰計畫，並調派將領分赴朝鮮各地，卻不主張立即開啓戰端，仍希望事情有所轉圜而不知日本真意，致失機先。

中、日甲午之戰爆發後，清軍節節敗退，故於開戰後不久，清廷即有意與日本媾和。清廷所遣瑞良等二十四名和談代表，雖於光緒二十一年正月五日抵神戶，卻不爲日方所接受，而不得不改派李鴻章父子前往，經過一波三折後，終於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，除二億兩賠款外，還將遼東半島及臺灣、澎湖等島嶼割讓日本。臺灣人士見割臺成定局後，曾建立臺灣民主國，以臺灣巡撫唐景崧爲總統，然此民主國有如曇花，瞬間即逝。當時的臺灣居民雖奮力抵抗日軍，卻寡不敵衆而失敗。自此以後，臺灣同胞便受異族的統治長達半世紀之久。

第五篇〈私販引起之倭亂與徐海之滅亡〉，首論明代，尤其嘉靖年間所發生寇亂與私商之間的關係，次言嘉靖二十年代寇亂與浙江巡撫朱紈掃蕩倭寇淵藪的梗概。朱紈雖因嚴厲執行海禁而頗能遏止寇亂的蔓延，卻因得罪與寇盜有密切關聯的貴官家，引起他們的不安忌恨。結果，落職、自殺。紈死後，撤備弛禁的結果，海內騷動，明廷爲之吁食者六七年，至竭東南之力，僅乃勝之。

嘉靖三十年代的寇亂係由私販所引起，勢家護持之。當時的寇亂起因原是小事，亦即因債務糾紛而起，而渠魁王直、徐海等素窟其中，以內地不得逞，所以都前往日本諸島爲主謀。倭人聽其指揮，乃誘之入寇。在此情形之下，海中巨盜遂襲倭服飾、旂號，並分艘劫掠中國東南沿海各地而無不大利，故倭患日劇。渠魁徐海出身杭州虎跑寺，隨其叔銓赴日後，在極短時間內居然成爲僅次於王直的大頭目，在浙海一帶作亂。雖然如此，竟中浙江總督胡宗憲的反間計，終於死在乍浦之沈莊，結束其戲劇性的一生，而浙江倭寇也因此得以漸次收斂。

末篇〈太田弘毅著〈倭寇——商業・軍事史的研究〉〉，敘述在有明一代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飽受倭寇擾害之際，那些倭寇到底從事怎樣的走私活動？前此學者所爲之倭寇研究，其成果雖頗足觀，惟那些研究大都傾向於倭寇的起源、組成分子、寇掠的實態，及他們對當時中國所造成的災害，或因此寇亂所引起中國官場派系的傾軋等，而著眼以倭寇之走私問題者不多。

雖然如此，日本東北女子大學教授太田弘毅，卻能利用〈明實錄〉、〈明史〉、〈籌海圖

編》、《武備志》、《日本一鑑》、《倭變事略》等史料，從商業的、軍事的層面來論述倭寇走私中國的焰硝、鐵至日本，與偷運日本所產刀劍、扇子、硫黃至中國等問題，及那些走私貨在中、日兩國用途等。此外，他也言及日本古代的八幡大菩薩信仰與倭寇之間的關係，而其說具有說服力。因作者在書中提出許多與眾不同的見解，故筆者乃不辭窶縷，逐篇作扼要的介紹，並於文末對該書所為論述表示若干意見，以就教於方家。

以上諸篇文字固不免有筆者主觀的看法，然而一旦出版，公諸大眾，就算是一步客觀化的歷程罷！尚祈海內外方家不吝賜教。

二〇〇四年歲次庚申仲春鄭樑生識於淡江大學歷史學系

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(三) 目次

序	一
日本中世禪林的儒學研究	九
朝鮮東學黨之亂爆發後日本陸軍之動態	五一
甲午戰爭前的中日兩國動態	六七
乙未割臺始末——一九八四—一九八五	一一一
私販引起之倭亂與徐海之滅亡	一四三
太田弘毅著《倭寇——商業・軍事史的研究》	一九七

日本中世禪林的儒學研究

一、前言

「德者善政，政在養民」，此固爲《尚書》所記載禹王的話，卻簡潔地表示了中國自古以來儒教政治思想的核心。天命使有德者爲天子，天子如失德，則此天命便轉移至他人，此即易姓革命。德政與易姓革命乃中國政治思想的兩大基石，儒教即由體君子之德的道德之學，與以君子之德來治國之政治學兩個層面所構成。（註一）

日本雖以《尚書》及其他儒家經典作爲大學的教科書，並用之以培養官吏，以爲輔翼帝德之資，卻以排除易姓革命爲前提，故其德治主義與中國有異，形成日本政治思想的特色。平安時代的儒學由公卿貴族執牛耳，然隨著時間的流逝，律令制度所規定的官吏之學問——明法道、明經道、文章道等學科竟產生興盛與式微的差異。故至中世時，最隆盛者爲文章道（日後之紀傳道），而經學研究與思想則一蹶不振，致學問與現實乖離。保元之亂（註二），尤其承久之亂（註三）以後，無論政權或朝儀都如桑榆暮景，欲振乏力，致大學教育與經學之研究傳統已失。但在

另一方面，經學卻有以新形貌來恢復活力的徵兆。

帶給日本中世經學研究活力者爲禪僧，他們鑽研儒學時所用教本與公卿貴族之用漢唐古註者不同，乃採宋儒新註書，給前此已經僵化、停滯不前的儒學研究灌注充沛的活力，而其研究成果亦有足觀者。因此，本文擬探討那些禪僧研究新儒學的情形以就教於方家。

二、日本禪僧與朱子學的關係

自從菩提達磨將禪宗東傳中國以後，至宋代已相當興盛而獲不少士大夫之皈依，此可由曉瑩禪師《雲臥紀談》、《羅湖野錄》，文瑩禪師《湘山野錄》、《玉壺野史》，方勺《泊宅編》，曾敏行《獨醒雜志》等北宋人之各種紀錄窺見其端倪。就宋儒新說之倡始者周、程、張、邵諸君子言之，他們與禪宗也有不少淵源。如據諸君子與宋代學者的紀錄，周濂溪曾就學於鶴林寺僧壽涯，與東林之常聰禪師，程明道學禪於興國寺，嘗稱禪之威儀曰：「三代禮樂在此」。程伊川則以釋迦爲西方賢者，言佛教亦有敬以直內之教。邵康節有《學佛吟》，其世界觀有根據佛說之概。張橫渠之氣聚散論似佛之輪迴說，《西銘》之宗旨則酷似明教契嵩禪師之孝論。（註四）至於南宋大儒朱晦菴，其師胡籍溪、劉屏山、劉白水、李延平諸儒皆曾學禪，而晦菴也曾問敬之義於文禮禪師，且珍重大慧宗杲禪師《語錄》。（註五）朱子學之得於禪教者爲心性說，故晦菴以心之本體爲虛靈不昧而具衆理，應萬物，以心爲萬事之根本與出發點。禪對心的修養有大、小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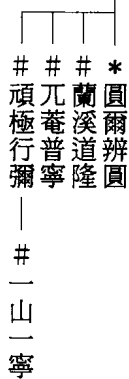
二法，前者乃隨時隨地處於無心之境，後者則是坐禪，亦即在一定場所，一定時間裏，以求達到淡然無心之境，而朱子學之修養法居敬、靜坐亦由來於此。（註六）

朱子學與禪俱以明心之本體爲要，然其歸趨雖同，徑路、方法則異。禪不立文字，故雖有修養工夫，卻不專事學問研究，朱子學則學問研究與修養工夫兼顧。前者之修養在坐禪，以心傳心，頓悟見性爲宗，後者則格物、致知、窮理、誠意，以明虛靈不昧之本體——心，一旦豁然貫通，便與禪之見性相同。此兩者的歸趨雖同，目的、立足點卻迥異，即朱子學立足於有（入世），禪立足於無（出世），前者智德不離，知行合一（研究：智、知；修養：德、行），使一身完美，以舉小而教化庶民，大而治國平天下之實爲目的，禪則無此目的。簡言之，朱子學係取禪之心學而予以儒化，以爲達到修齊治平之目的之基礎；取禪之修養方式，使之成爲有秩序的、平易的而無弊害，亦即將它作儒教的改良，並從事知慧的研究，使之成爲實際的、世間的一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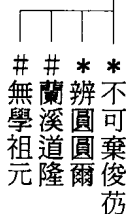
（註七）

如據日本史乘的記載，將朱子學首傳至扶桑者爲不可棄乘俊苒法師，之後則有赴日傳布禪宗的華僧蘭溪道隆、兀菴普寧、無學祖元、一山一寧，及至中國學禪之日僧圓爾辨圓等。中、日兩國的這些僧侶所師事者俱爲南宋之禪僧，其通曉朱子學者則爲北磻居簡、癡絕道沖、無準師範、環溪惟一等臨濟宗名衲。茲圖示如次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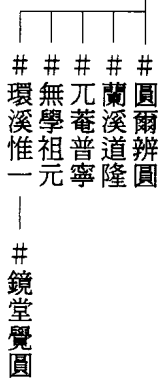
癡絕道沖



北磻居簡



無準師範



華僧
* 日僧

(註八)

由上圖可知，將朱子學傳播日域之中、日兩國僧侶，均曾師事癡絕道沖、北磻居簡、無準師範等高僧，他們對宋儒新說均有精湛的研究，而尤以癡絕、北磻為然。癡絕云：

大哉心乎，巨無不周，細無不久；增不為贅，減不為虧。默爾而自運，寂然而善應。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。方體不能拘，度數不能窮，昭昭然在日用之中。而學者不得受用者無他，蓋情想汨之，利欲昏之。細則為生住異滅所役，麤則為地水火風所使。忘己逐物，棄真取偽，卒於流蕩不返者，舉世皆是。儻能去心之蔽，復性之本，於日用之中，明見此心，則情想利慾，生住異滅，地水火風，皆為吾之妙用。(註九)

此語有如朱子學派之心性論，明顯受到程、朱二子復性說之影響。又云：

儒者曰：「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，則居之安，居之安，則資之深；資

之深，則取之左右逢其原，故君子欲自得之也。大凡欲明個事，須有自得之妙。然後心未忘，則不能居之安。居安之地不脫，不能資之深。果能忘其所得之心，脫去居安之地，資深之域，皆為吾之妙用。（註一〇）

此係引《孟子》〈離婁篇〉之語，以言道在自得，且將左右逢原的境界比作禪教的頓悟見性，以融合儒、釋兩教。北磻則云：

大乘之書五部，咸在釋氏，所以破萬法者也。為《詩》，為《書》，為《禮》，為《易》，為《春秋》，則聖人所以妙萬法者也。初以《般若》破妄顯真，則《詩》之變風變俗也。次以《寶積》顯明中道，則《書》之立政立事也。次以《大集》破邪見而護正法，則《春秋》明褒貶，顯列聚，大中之道也。次以《涅槃》明佛性，神德行，則《中庸》之極廣大而盡精微也。次以《法嚴》圓融理事，則《易》之窮理盡性也。（註一一）

此乃言大乘佛教的五部經典與儒家的五經旨意合而兩教一致，且以《中庸》代表《禮記》，說它「極廣大而盡精微」；《周易》為「窮理盡性」之書；《春秋》則合乎「大中之道」，這很明顯的在祖述朱子之學。

一二六〇年（南宋景定元年，文應元年）赴日的兀庵普寧，他說儒、釋兩教之一致曰：

儒教亦云：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」。此本即是自己本命元辰，本來面目。得此本立，方可得道生，本若不立，何緣得道？（註一二）

此係解《論語》〈學而篇〉有子所言「務本」之本爲心性，它與禪教之本來面目同一不二。一二六九年（南宋咸淳五年，文永六年）東渡的大休正念則言儒、釋、道三教之一致曰：

文行忠信，常樂我淨。清淨無爲，各正性命。三足鼎分今，乾坤泰定。（註一三）

談實相，興禮樂，抱至一，等先覺，覺乎後覺。覺此道於渾沌之前，返澆漓而復于大朴。

（註一四）

此言孔子之文行忠信，釋迦的常樂我淨，老子的清淨無爲，俱爲正性命之道，故三教無不以明心爲要，而道出三教一致之所在。其言釋迦之談實相，孔子之興禮樂，老子之抱至一，而各覺後覺，而施教之跡彼此有異。至於以儒教言明心之要，則係根據朱子學而來。（註一五）

一二七九年（南宋祥興二年，弘安二年）受鎌倉幕府執權（職稱）北條時宗之聘前往日本的無學祖元，也甚受日域人士之尊崇，北條不僅親執弟子之禮，還在鎌倉建圓覺寺以之爲開山（一二八二）。無學曰：

坐禪之時，一切放下，此身此心，要與太虛平等圓滿，而不見太虛之量。（註一六）

不隨聲色名利，死生恐怖，便隨六道輪回，處處作用，處處出沒，處處遊戲。入火不燒，入水不溺。在方同方，在圓同圓。與太虛同一相貌，謂之圓覺道場。（註一七）

道學先正心，正心可學道。（註一八）

此係將心比作太虛，以言心即太虛，這種說法可能是根據張橫渠之太虛說而來。王陽明以心有人